

← (上接14版)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汇校时曾考察过的一个有名的抄本D(斯特拉斯堡卷本编号C VII 7)在他们考察过后的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中毁于战火。因此,他们对该抄本作出的校记今天就显得弥足珍贵。

Keller和Holder通过汇校刻画出了贺拉斯诗集古抄本流传情况。他们主要依据对所校抄本中所含舛错的分析,将存世抄本分为三类,它们分别是:

第一类:属于此类的存世抄本最多,而且其中所含舛错最少;凡有舛错,几乎都是由中世纪学者篡改所致;然而抄本中全然不见诗人所生时代惯用字词拼法(拉丁文就像后世的英文一样,同一个字在不同时代的拼写可以是略微不同的),从这一点可以判断属于这一类的抄本的写成时间都是比较晚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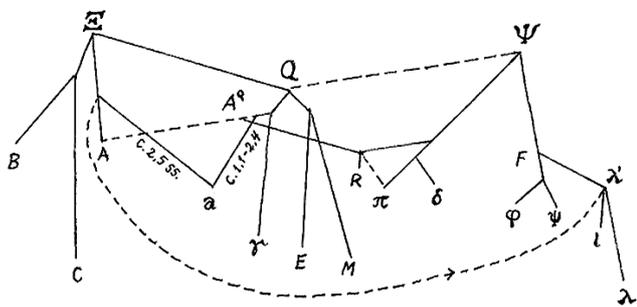
第二类:属于此类的存世抄本中包含异文比较多,然而似乎皆出自古代晚期学者之手,比如执政官Flavius Vettius Basilius Mavortius(公元527年任执政官),异文似多因他涂乙原文所致,由此判断这类抄本的书写年代较早。

第三类:属于此类的存世抄本中所包含的舛错最多,然而多为手民笔误,是比较低级的错误,易于订正,但是这也说明它们在传抄过程中没有经过后人的“纠正”乃至擅改,因而这一类抄本被认为是存古

(次)原型,认为传世抄本都是由这两个(次)原型抄本转抄下来的,而这两个(次)原型又同出自一个唯一的祖本。Vollmer认为,后世抄本皆源自活跃于公元1世纪、即诗人身后百年内的文法学家M. Valerius Probus所勘诗人诗集定本,后由古代晚期学者Porphyrio加注,复经Mavortius校订落款(subscriptio),自此一分为两个转抄卷本(apographon),分别命名为I和II;传世抄本皆可视为传抄自此二转抄卷本。

Vollmer之后,英、德、意等国在20世纪里又陆续出版过数种贺拉斯诗集汇校本,良莠不一,其中最权威、最可靠的是德国学者Friedrich Klingner的Teubner本(最终修订版出版于1950年)。在他编纂的诗人全集中,Klingner把传世抄本分为Ξ与Ψ两个原型属类和一个由二者混合而成的次原型属类Q。他的这种分类其实基本上继承了19世纪学者Keller和Holder的三类说,在判定三者的源流关系时,特别是在判定Ξ与Ψ两个原型之间的关系时,借鉴同时也修正了Vollmer的学说,在表述上总体而言要比前人更简明更清晰。依据他所建立的古抄本流传模型,Klingner绘制出诗人各部诗集(《杂诗集》《短长格诗集》《赞歌集》《书信集》等)的古抄本源流枝干图,其中《赞歌集》的抄本枝干图是这样的:

## 讚歌集



最正的,权威性不仅高于第一类,也高于第二类。

Keller和Holder的三类说为现代贺拉斯诗集文本校勘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他们之后,德国古典语文学家再接再厉,先是于20世纪初出现了Friedrich Vollmer校本。虽然Vollmer其实没有来得及做一部贺拉斯全集的校勘本,而只是出了一部《赞歌集》校勘本,可是他是继Keller和Holder之后,对贺拉斯文本校勘研究作出过突出贡献的人。他的贡献主要在于把Keller和Holder的三类说简化为两类,他用罗马数字I和II分别代表这两大类古抄本各自的重构

在这幅图里,Ξ代表据推定曾经存在过的诸抄本原型之一,Ψ代表所推定的原型之二;Ξ与Ψ是否像Vollmer所推断的那样,在历史上出自一个更早的唯一原始本,在Klingner看来则无法从现存文本中推断得知。在这两个由大写希腊字母所代表的原型之外,图中大写罗马字母Q代表据推定曾经混合了Ξ与Ψ所形成的次原型。然而无论是两个原型写本本身还是次原型写本,都早已散佚。图中其他的大小写希腊和罗马字母分别代表现存各个古抄本,例如A代表巴黎国立(原王家)图书馆藏(编号7900,原本遭人割裂,割去部分

藏于德国汉堡市立图书馆)羊皮纸卷写本,据考证书写于9—10世纪,该本应直接或间接抄自Ξ;而直接或间接抄自Ψ的F其实含两个写本,代号为φ者为巴黎7974写本,代号为ψ者为巴黎7971写本;混合了Ξ与Ψ两个抄本系统的写本则有意大利米兰图书馆藏编号O138写本,图中代号为a,图中标出的其他抄本我们就不在此一一列举了。另外,图中虚线所连接的是据猜测彼此之间有关系的写本,实线连接的是被确定彼此之间有传承关系的写本。总而言之,我们这里引用的贺拉斯《赞歌集》古抄本传承源流枝干图是西方古典文献校勘学中汇校阶段工作成果的一个范例,它最直观地显示了西方古典校勘学对于文本汇校工作的理解和要求。

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从以上的描述和举例来看,尽管汇校的过程中免不了要有所判别,拉赫曼方法中关于汇校的程序仍是个相对机械的操作过程。在西方古典语文学中,关于这个方法其实也是存在争议的,例如同为贺拉斯学者的20世纪意大利人Giorgio Pasquali(1885—1952)就曾专门著书批评这种机械的方式,他更强调主观性在校勘工作中每个阶段的重要作用。

在拉赫曼方法中,紧接着汇校之后,第二部分的操作手法便是判定(examinatio)。

与相对机械的前一个程序汇校相比,判定过程则加入了更多的主观因素。这个过程是要通过考察作者的语言、风格、思想、以及作者习用的语句来判断各种异文乃至各本的优劣。不同抄本的异文中如果其中有一个或数个属于明显的错误——例如语法错误、诗歌的格律失叶、明显的错字等等——异文的优劣正误当然很好判定,而出错的异文其实就是舛误而非真正的异文。但是如果同一文本的某个抄本里出现的异文并非明显的舛误,而是能自圆其说、文义自洽、合辙叶律,那么编辑的判定作用和角色就体现出来了。这个道理并不难懂,但是要充分了解判定过程的实际操作情况,我们还是应该举例说明。现在就让我们先看看贺拉斯《赞歌集》I 12的最后两节诗:

ille seu Parthos Latio imminentis  
egerit iusto domitos triumpho  
sive subiectos orientis orae 55

Seras et Indos,

te minor latum reget aequos  
orbem:

tu gravi curru quaties Olympum,  
tu parum castis inimica mittes  
fulmina lucis. 60

他[案罗马始皇奥古斯都]或将驱赶威胁拉丁国、为

正义的凯旋所降的帕提人[案波斯人],

或旭日之边下面的丝国人[案中国人] 55

和身毒国人[案印度人];

次于你[案罗马至高之神犹庇特],他[案奥古斯都]将均乘式廓全地;

你将以辘轳震撼奥林波山,  
你将朝不够洁净的圣林擲

敌对的霹雳! 60

原文中用黑体字母标出的字latum(译为“式廓”),不同抄本之间是有异文的。在Klingner版贺拉斯集中,编者为此字提供了这样的校记:

latum Ψ laetum Ξ σχΓ ν

校记的意思是说,《赞歌集》古抄本中,Ψ类古抄本作latum;而Ξ类若若干古注本(如伪Acro注)则读laetum。latum直译为“广袤”,作广袤读显然意谓至尊统辖的罗马帝国肇域式廓广袤;而异读laetum可译为“喜乐”,作喜乐读意思是说其所辖之地皆乐为其所御。laetum用在这里,不免让我们想起王安忆先生的小说里提到过的旧时歌词:“五洲人民齐欢笑”,laetum也实在就是这个意思。

把这两个形近义别的字分别放在诗中这句话里,音节格律都没有问题,意思也都说得通。虽然我们前面提到过,Ψ系统的抄本权威性略微高一点,但是在这里并不能仅仅据此就裁断latum为是,laetum为非。于是采纳latum还是laetum,便是个见仁见智的事,几乎完全依学者的个人喜好而定。从贺拉斯诗集的近现代版本看,多数版本从前读,作latum;仅Ritter, Wickham, Vollmer,

Ξ: AQ(= aDEM acc. interd. R) acc. interd. λ | Ψ: Fλ'δπR  
35 pinnis A<sup>1</sup>R<sup>1</sup> lemma σχAf pennis cett. || 37 ardui] arduum  
EMR<sup>1</sup> lemma σχAf

Bailey, Nisbet/Hubbard等从后读。我自己的贺拉斯翻译和笺注也是从前读。因为我觉得,不仅仅是属于Ψ这个系统的文本更权威,而且“广袤”的诗义也比“欢笑”要好。读作“欢笑”,感觉有点滑稽,带有出乎诗人用意之外的讽刺,故而我的中译取了广袤的诗意。只是我并没有使用“广袤”这个词,而是用了“式廓”这个来自《诗经·大雅·皇矣》中的表达式:“上帝眷之,憎其式廓。”毛《传》曰:“廓,大也。”

拉赫曼方法中第三个程序是最主观、也是最容易产生争议的操作,即订补:emendatio。之所以需要对传世文本作出订补是因为,当抄本出现明显的谬误,例如有一个字不叶格律,不合文法,或这个词或这段话没有意义甚至荒谬,但是却没有一个古抄本能提供一个合理的读法时,当抄本中有脱字脱文而没有其他完整的抄本可用以参照补足时,编者就需要对文本进行订补了。在这个时候,为了生成最接近作者本意及文本最初形态的现代版本,编辑要对传世文本作出被认为是必要的纠错或补充。传世文本中包含的需要订补的错误包括:1.抄本所特有的(受时代所限等等);2.因音似而生错;3.脱字(字母、相似相同字跳跃;漏行);4.衍文(重抄、注文窜入);5.字母、字、诗行、句或句中部分错置;6.上下文所引发舛错;7.观念错误;8.前人篡改等等。

以拉赫曼方法编辑了古代文本之后,将校勘编辑完成的文本出版,这样的现代版本就叫做校勘版(editio critica)。在西方,最权威的两个古典文本校勘本出版社是英国的牛津和德国的Teubner,此外法国的Budé和意大利的一些也出版过重要校勘本。这种古籍校勘版本在格式上照例皆含有一篇前言(praefatio),说明编辑的原则,再附加抄本流传枝干图、所用古本目录和代号凡例以及其他一些相关表格;在正文部分,在每一页正文下面,则有以脚注形式出现的校记(apparatus criticus)。读者查看校记,再参考前言中的代号凡例和抄本枝干图,便可以完全掌握传世文本的各种异读、后世学者的重要订补、乃至该版编者本人对文本的处理。例如Klingner版的贺拉斯全集中某一页的校记是这样的:

读者查看该版的前言可以得知,校记中单个的大小写希腊(Ψ、λ、π等)与罗马字母(A、Q、a等)都代指哪些古抄本原型、次原型与存世古抄本,校记中间杂一些拉丁文缩写(斜体)则是对各本乃至编辑情况的简略说明,例如cett.表示其余诸本等等。有了这样可以互指互证的前言和校记,一部古代文献的汇校版就完备了。

(作者为美国瓦萨大学教授)